

两岸命运共同体与两岸公共生活的建构

——以两岸民众的沟通为中心

王 茹*

(厦门大学 台湾研究中心, 福建 厦门 361005)

摘 要：海峡两岸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在不少领域里存在差异，民意也有歧异与落差。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显现、维系和生长离不开两岸民众的交往、沟通。通过多年两岸的往来，当前两岸共同市场已见成效，其他领域的交流和交往也有相当的规模，在此基础上，建构两岸公共生活的努力会使两岸民众有更多真诚的沟通与意义的分享，有助于两岸民众形成沟通、理解与共识的相处之道，提高两岸命运共同体的亲和力、凝聚力。

关键词：两岸命运共同体； 公共生活； 公共领域； 沟通

中图分类号：D60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1590(2006)03-0001-07

共同体即是由共同的纽带所维系的群体，共同体的范围可大可小，小至家庭、社区，大至国家、民族，甚或超国家的结合如欧洲共同体。这里所提及的命运共同体，是国家、民族意义上的。在当前阶段，两岸的同质性如何得到显现、维系和生长，是一个重要的课题。最近国台办提到了“两岸同胞已经结成实实在在的‘命运共同体’”。^[1]这一提法不仅使多年来两岸经由交流交往，达致“了解、理解、和解、合作、共赢”的实践名至实归，而且也指明了两岸历史与现实不可分割的联系。^[2]

因为两岸过去长时期的隔绝、内战状态的未完全结束和当前两岸间复杂的情势，使得两岸命运共同体的性质虽然没有发生变化，但已经有裂痕有损伤，而如何去修复去弥补，是不能忽视的问题，也是必须面对的挑战。目前两岸呈现出一方面存在差异和认同的分歧，另一方面融合和一体化也在持续进行。两岸如何进行进一步整合，两岸不少学者都曾提出过宏观的解决机制，但很少涉及两岸普通民众在交往中如何相处的问题。事实上，两岸之间的整合或一体化的加深，不仅仅需要高层或宏观的解决机制，也需要两岸民众日常的交往中建构良性的公共生活，在对话、言谈中达成沟通、理解与共识。

两岸关系受情感的困扰其实很深。两岸之间的政治情感及其转化是一个非常复杂、多层次、幽曲的过程。大陆和台湾各有各的焦虑和问题，仅仅靠物质或制度层面的一体化措施有其盲点。两岸的整合，还需要两岸

* 作者简介：王茹，女，厦门大学台湾研究院助理研究员，“985”工程二期台湾研究创新基地成员。

的参与者在细节上、在日常的微观交流场域中一点一滴建成。

一、命运共同体与公共生活

当我们说到命运共同体，便有着命运相连、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涵义。历史上两岸无疑同属于一个命运共同体。1895年日本殖民者强行割去、侵占宝岛，两岸被迫隔绝，产生了一些差异，但当时台湾的主要矛盾是民族矛盾，台湾民众的斗争和反抗是针对日本的殖民统治，其民族感情是认同中国的，除了极少数皇民化分子外，多数民众非常盼望回归祖国。抗战胜利，台湾回归祖国，两岸恢复往来，而台湾民众和政治精英也怀着高度的政治热情参与了当时的地方和“中央”层级的选举，如省参议会、“国民参政员”、“制宪国大代表”等的选举，这些表明台湾的回归祖国不仅为《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等条约所规定，而且台湾同胞也以积极主动的参与态度表达了对自己国家政权的认同。但国民党并没有注意纾解在实际接触中台湾民众所感受到某些具体的差异和不满，结果是战争造成的破坏与遗留问题、国民党统治无方与腐败残暴以及当时的政治体系没能处理好台湾民众的政治参与要求，最终酿成了惨痛的“二·二八事件”。国民党于1949年败退台湾后，两岸不仅处于内战状态，而且被纳入到美苏对峙的冷战国际格局中。冷战的格局、内战及地理条件造成了两岸意识形态的对立和管辖上比较清楚的切割，使得两方民众的社会联系与交流绝大多数都是在各自内部进行，双边对对方的政治生活乃至日常生活，有意识形态框架下的种种想像与攻击，两岸在各个领域上的差异也逐渐有所增多。然而尽管如此，这并没有导致对“中国”和“国家统一”认同的断裂。所以这一时期两岸种种恩怨爱恨的纠缠仍可以作为命运共同体的另类经验。当祖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出台和平统一政策，台湾也在1987年宣布“解严”并于当年11月开放一般民众赴大陆探亲之后，台湾民众往来大陆日渐频繁，大陆民众赴台虽受到较严格的限制但数量亦不少，两岸的交流交往在各个领域内的深度和广度都在拓展，两岸的差异开始渐渐缩小，两岸在某些层面已经出现了融合和“一体化”的状态，其实两岸命运共同体在过往的基础上就已经重新生出更广阔的领域。然而另一方面因为台湾政治转型走上“省籍—族群—本土化”的路线，导致台湾民众的“国家认同”出现歧异，台湾当局在李登辉执政期间及陈水扁上台之后，以“戒急用忍”性质的限制性措施阻遏两岸的往来，“去中国化”、往“台独”方向切近的政策与言行不断出笼，两岸政治上常常处于僵局状态，冲突甚至危机不时闪现，因此出现了两岸经济交流热而政治冷的“政经分离”局面，两岸民意在“统独”等问题上的落差日渐突出。

对于两岸如何整合或统合，两岸学者已提出了各种理论架构，例如台湾学者魏镛先生从中国历史上分合的经验和当前两岸整合的态势，提出了“两岸均属于一个‘历史、地理、文化的中国’为前提的‘民族内共同体’已经在逐渐形成之中”的观点。^[3]张亚中先生提出了“两岸共同体”独特的建构方式。^[4]这些理论关注的是两岸在经济和政治等方面的高层或宏观的解决机制，本文更关注的是两岸普通民众在交往交流中如何相处的问题，即两岸公共生活中的沟通问题。因为两岸问题早已经不是两岸的正式机构、高层或学者们处理或坐而论道的问题，它们是两岸民众在日常生活中就会时常遇到的切身问题，两岸民众的相遇、接触与交流每时每刻都在发生。

在当今时代，共同体之结合更注重建立在共同分享的基础或共同追求的目的上，并关注于内部构成分子之间的有机关联、沟通与分享、认同和参与。^[5]因此，命运共同体的显现、维系和生长已经不能够离开公共生活的参与，不能够离开公共生活或公共领域内真诚的沟通和意义的分享。公共生活是个人以主体间性与其他人交往而形成的交叉重叠之领域。^[6]因此它不仅是指一些人生活于同一个区域、共同经历事件，而且是指这些人有意识地彼此沟通，共同参与并分享生活中经历事件的意义。在暴力和强制越来越消退、隐匿的时

代，言谈、交往和沟通就成为公共生活最主要部分。在古希腊的城邦公共生活里，言谈就已经占据了重要的位置，根据汉娜·阿伦特的阐述，希腊人认为生活在城邦这样的政治共同体中，“就意味着所有的事情都要通过言辞和劝说而不是通过强制与暴力来决定”、“所有公民关注的中心就是彼此间相互进行交谈”。^[7]虽然现代政治共同体的规模大大超越了城邦共同体，全体公民间进行直接面对面的交流是不可想像之事，但印刷资本主义和其他各种现代媒体的发展使资讯得以大量、快速流通，现代性的公共流域得以形成，所谓的想像共同体早已超越了面对面接触范围的限制。

两岸之间联系已经如此紧密，两岸民众对两岸议题的关心和讨论也已经不是双边内部发生的事务，毫无疑问两岸民众不仅有互动行为、有共同经历的事件，而且也早已开始寻求价值的沟通与意义的探寻。两岸的民众在参与两岸公共生活中，才能更深切地体会到同胞的涵义，以实际的言行去充实、构造这个名词的丰富内涵和情感意义，而不是使之干枯成为没有情谊互感的指称词。以两岸公共生活和公众的特质来看认同问题，就不仅仅要注重将历史渊源与文化传统、法理依据和目前广泛的经济相互依赖等作为命运共同体认同的粘合剂，而是要在此基础上，更注重两岸民众在接触、交往中能否有助于沟通、理解与共识的达成，有助于共同参与建构良好的两岸公共生活。

二、两岸公共生活与沟通

两岸民间交流的功能是接续两岸以往的中断，在海峡两岸重新联结、形成与维系承载着种种情感的、经济的、文化的、理念的、生活的纽带，使得两岸的一体化进程更快速。然而，两岸民众的成长背景、生活方式、共享的记忆、政治文化等等都有相当的不同，其差异性大过各自内部的差异性，而且两岸公共生活在初始阶段，可能更会显示两岸的差异，这些差异原本不必然成为沟通的障碍或冲突的起因。但因为两岸隔绝时间比较长、内战状态的未完全结束、对抗性思维的遗留等形成了若干不利于两岸良性公共生活的因素。例如在台湾内部，政治转型以来李登辉和泛绿政治势力力图把两岸操弄为“敌我关系”，而大陆尽管不无努力，但仍有种种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这种种因素造成两岸的某些差异很容易演变为冲突的源头。因此两岸公众如何培育或形成沟通、理解的心态及相处之道，以期形成良性的两岸公共生活，是两岸交流交往中需要进一步发展的课题。目前两岸的政党、一些学者和普通民众都已经有意识地成为建构两岸公共生活的机制、议题及沟通相处之道这一事业的积极推动者。从两岸建立公共生活的机制看，必须在两岸交流的各个领域共同发展出可以进行深入对话的空间，这不仅需要加快直接“三通”的进程，更需要本着同情的理解和沟通的态度，使两岸民众能够有更多的机会进行无阻碍的交流。

这些年来台湾民众往来大陆每年都有三四百万人次，而比较长期居住在大陆的台商、台干、台生等据说亦有三十万以上，大陆赴台交流的人次虽然远远及不上台湾往来大陆的，但数量也不在少数，这样两岸民众参与各式各样的面对面的交流场合就非常多，更不必说现代数字通讯技术的发达，使得两岸的民众可以直接通过网络等媒介进行对话与讨论。两岸的报纸或广电媒体虽然无法为对方所直接收视、阅听，但通过网络传播，以及两岸互相驻派记者和两岸传媒界业已形成的一些互动和合作，使得两岸民众对对方都具有一定的信息量。因此，虽然两岸到现在还未实现直接“三通”，两岸的媒体也不能自由交流，两岸民众的沟通和交流受到极大的限制，但在某种程度上，两岸存在着最低意义上的公共生活，并且还有着广阔的发展空间。公共生活的主体是公众，而公众是不特定的个人在关心、讨论共同问题，参与共同事务中产生的，它不是先在的身份赋予，换句话说，当个人参与了才是，当他退出，不再关心时就不是了。每一个人在任何时候都可以选择成为公众。两岸民众，无论其身份背景、政治立场、智愚贤肖，当他们只要关心两岸事务，参与与对方的讨

论和沟通，都是两岸公共生活的公众。其实，无论何种场域，只要它们有两岸民众的沟通参与，或存在着两岸民众的交流与沟通，都可以算作两岸公共生活或两岸公共领域的组成部分。2005年两岸经由“胡连会”和“胡宋会”等，大陆和泛蓝各党都达成了一系列旨在更进一步交流的项目，如两岸精英论坛、两岸青年交流等等，它们经参与者的努力，应可建成为两岸沟通、理解的示范性交流场域。

两岸公共领域的议题，应该是没有限制的，两岸同胞关心的任何问题都可以作为讨论与沟通的题目。然而，从培育良性的两岸公共生活出发，在诸如两岸精英论坛、两岸青年交流等场域当前最好找到一些能够引起两岸共鸣的交流议题或在当前条件下能够解决的问题作为议题。这样做是为了双方更易于求同存异，更好地见到成效，联络情感。不可否认，这样经由政党间组织的民间交流确实有人为选择的成分，但只要不是故意操纵的行为，而且经参与者同意，应得到理解。

然而，两岸公共领域交流最重要的是沟通规则建立。公共生活中如何理性沟通，德国政治哲学家哈贝马斯对此有详尽的研究。他为公共领域设置了“对话伦理”的规范要求，认为“理想言说情境”里必须满足以下要件：第一，任何具有言说及行动能力的人都可自由参加对话；第二，所有人都有平等的权利提出任何他想讨论的问题，对别人的论点加以质疑，并表达自己的欲望与需求；第三，每一个人都必须真诚表达自己的主张，既不刻意欺骗别人，也不受外在的权力或意识形态所影响；第四，对话的进行只在意谁能提出较好的论证，应该理性地接受这些具有说服力的论证，而不是任何别的外在考虑。^[8]这些条件看起来很平常，但实际上在很多情境里是无法全部满足的，尤其在价值分歧日甚、多元主义各持一端的当代，“理想言说情境”因此只能成为批判现实的理论对照。台湾学者江宜桦认为，如果考虑弱一些的条件，可认为当以下四个条件满足时，如存在共同关心的议题、愿意了解他人的想法、以语言进行互动、接受较佳论证的效力，公共领域的成员就可以进行有意义的沟通。^[9]当然可以比照高标准的“理想言说情境”来寻找两岸公共领域的不足与缺失，事实上我们会发现其缺陷之多，足以使人产生悲观之感，然而两岸公共领域或两岸公共生活的建构的出发点只能从现实所能够提供的条件做起，从低端做起。这是一个漫长积累的过程，两岸公共生活所受到的限制、两岸公众或强或弱的“我执”心态、语言暴力的阴影等等都使得两岸的有心人士可能需要付出长期的、艰辛的努力。不过，正如阿伦特所说“在公共世界的条件下，现实主要不是由组成这一世界的所有人的共同本质保证的，而是由这样一种事实保证的，即尽管角度不同，因而看法各异，但每一个人关注的总是同一客体”。^[10]所以，不论存在着怎样严重的限制、各种缺失和不足，但两岸客观存在着共同关心的议题是我们出发的保证。在肯定了存在着共同议题这一事实之后，首先必须承认的是，除自身之外，公共生活还有其他人的参与，除了表现自我的主体性之外，还必须进一步了解其他人的想法。

两岸的公共生活，或者说所有的公共生活，就是由不同背景、利益、兴趣的人组成的，每一个参与者首先就必须承认生活本来就是参差多态的，每一个人过往的经历、所受的教育、当前的位置和利益、兴趣、看问题的角度等等都会使得其立场或言行有所不同，这种差异与不同是公共生活空间的常态而非特异。在公共领域里，这种不同与差异之间正需要沟通，以尊重换来尊重，以沟通去达到共识，而不是强求共识。参与者在公共领域里可以争议，可以辩论，但不要谩骂，不能使用语言暴力，不要故意制造冲突。两岸之间，无论是研究者，还是普通民众，都须重视“了解两岸的共同性与差异性、对对方要有同胞情谊、本着同情的理解”的原则。^[11]或许在当前这一阶段，关于两岸政治问题的最终解决难以达成共识，沟通的障碍仍然存在，但两岸民众在共同参与两岸公共生活中会使两岸民众有更多真诚的沟通和意义的分享，还有在互动中所形成的“了解、理解、和解、合作、共赢”相处之道及其由此而累积的社会资本，都有助于两岸的学者和民众会更好地体会两岸的共同之处，更好地理解两岸的差异及形成的历史原因，以两岸的差异来丰富彼此，并寻求如何避免冲突，如何创造与共享未来的前景，而不是在冲突的气氛中失却彼此这样的机会，也失却两岸和平双赢的前景。

三、两岸民众的沟通与心结的转化

两岸的公共生活除了增进差异的理解之外，还要更进一步要纾解恩怨纠缠的心结，纾解各自的焦虑，以宽容之心化解种种不良的情感。

理解首先就必须从两岸所经历的历史说起。当前台湾民众中出现“国家认同”异化，一部分人把“台湾意识”、“台湾结”等操作为与“中国意识”相对抗的产物。这造成了伤害。然而，要考虑到之所以产生出这样的意识，是与台湾特殊的历史际遇分不开的。台湾被日本殖民者侵占，在一些台湾知识分子和民众中萌生了“弃儿意识”，自认为是“亚细亚的孤儿”。五十年的殖民统治过后，国民党政权不仅没有能够好好的梳理引导，反而在光复后不久就发生了令人伤痛的“二·二八事件”，其后又以专制统治压制台湾社会，使各种民间力量无从显现和发展，所采取的一些政策也使族群矛盾潜伏下来。当台湾社会的民间力量有能力在政治转型期的政治参与中释放自己的能量的时候，由历史所沉淀的悲情不可避免地爆发出一些不理性的倾向。

悲情与怨恨的弥散，在台湾政治转型过程中成为主导的情绪。一方面，过去的不公不义必须要纠正，但另一方面，却也要警惕这些心态的无休止的蔓延。然而，恰恰是政治转型的初期阶段，因为“它提供了各种自由表达的手段，其中也包括表达仇恨和压迫感的手段”，^[12]此时如果一些政治势力和政治精英若是有意加以利用或刻意挑动，而其他的政治精英和公民社会组织又无法纾解，或是政治体系里容纳冲突的机制没有建立或功能不彰，那么怨恨的蔓延乃至冲突的爆发，尤其在种族或族群间，是容易引发的。在各国和地区，这样的例子并不鲜见。台湾政治转型走上“省籍—族群—本土化”的路径多多少少与此不无关系。而现代性心性结构中的怨恨更具有“价值位移”和“价值颠覆”的能量，处于这种心态的人，难以形成真正或正确的价值判断，而台湾社会对外的怨恨和对内的怨恨，彼此强化，导致社会整体的迷乱与价值位移，部分“台独”论者出于对大陆的怨恨，因而对“去中国化”和“本土化”更加执著。^[13]这种执著随着时间的推移，焦虑感愈盛，李登辉所谓的 2008 年“台独”时间表就是其表征。李登辉和民进党极力强调中国大陆对台湾人的威胁，强调中国大陆与台湾的不同，把中国大陆塑造为与台湾有着不可调和的矛盾的“他者”，对台湾社会有极大危险的“他者”，从而巩固这种敌我意识，被塑造出来的中国大陆的“他者”的身份正成为建构台湾主体意识不可或缺的基础。

李登辉和陈水扁在政治上及其他方面屡屡有“台独”言行的挑衅，使大陆不得不采取强硬措施。而自李登辉的“台独”态度越来越显露以来，眼看着李登辉及其后的陈水扁“去中国化”的政策越来越冲撞大陆的底线，大陆的一些人也产生了对“台独”时间表的焦虑感，不能够理解这些台湾民众悲情与怨恨的由来及其政治转化的幽曲之处。因此，当遇到刺激性的言论，就会不假思索地回应，或是自己也发出刺激性的言论。在观念的碰撞和冲突场合，这种因为立场的不同、性格的因素而失却了交往的文明性的情况，在网络中可以看得更为清楚，尤其是在两岸政治僵局与危机的时刻。所以，回过头来看，最近这十多年来两岸的政治僵局、一些风波冲突以及有效沟通的缺乏，使得部分台湾民众更增添了对大陆的隔阂，一些人甚至对大陆人都有偏见和负面印象。^[14]无庸讳言，一些大陆民众对台湾同胞也存在着刻板化的印象和某些偏见。其实互相刺激愈加会激发价值位移所带来的不良后果，而相互的隔膜和偏见造成了两岸同胞情谊的弱化。要避免这种现象的发生，从两岸民众个体层次上来说，都需要有一种深刻的反省与反思的态度，首先必须以同情心去理解这种种怨恨与悲情的由来，我们才有可能共同“超越怨恨，告别悲情”。^[15]

集体焦虑本是提醒问题的存在，而不是被焦虑感所控制，疗救由焦虑所引发的种种心结还需要某种有意识的集体社会心理方面的纾解，而不仅仅靠两岸经济和利益方面的双赢就能够完全解决。这样的纾解，需要两岸间公共知识分子的引导，更需要两岸民众在交流中自我启发，这种恳谈不仅要理性说理，还需要情谊、爱和包容。大陆的参与者以同胞情谊为重，就须将对抗性思维减至最低，最好彻底放下。^[16]因此，对待台湾的“国家认同”异化问题，对待某些刺耳的言辞，大陆的参与者不要把每一个或强或弱的持有这种观点的台湾

同胞都视为“台独分子”，即使是“台独分子”，也不尽然就要先端出强硬批判的架势，而是要有耐心，懂得聆听并懂得沟通、转化之道。例如在当前引起诸多争论的“文化台独”问题上，大陆的参与对话者就必须正确辨识“文化台独”与一些文化倾向上的本质区别，如强调台湾乡土教育，及强调台湾文化某些特殊性的区别；把当政者或某些势力的政治图谋与台湾普通民众热爱乡土的情感分析清楚，了解和理解台湾本省普通民众因为国民党过去长期抑制、打压“本省乡土文化”所产生的一些逆反心理。^[17]同样的，台湾民众也可理解到大陆追求统一，并不是要以大陆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体制取代或压制台湾，大陆批评某些“台独”行为并不会针对或迁怒于普通台湾同胞。

两岸之间心结的解开，应该是一个情与理共同作用下的沟通艺术的展开，“只有双方都能够透过各种艺术媒介而倾听、凝视和面向对方，进入对方的生活脉络和历史情境之中，透过情感的互动和交流，一种内在的亲密关系才可能建立，族群间的藩篱才可望拆解”。^[18]在这方面，台湾民间组织进行的一些有关族群和解的模式和经验可提供一些启发。组织者设置了一种不预设立场、开放的和没有结论的深度座谈模式，通过让参与者观摩他们制作或利用现有的与此议题相关的影视资料，并让参与者讲述自己的亲身经历，将外省人与本省人在各自的生命史上受过的创伤呈现出来，并在议程的安排中尽量创造让参与者敞开心扉，让参与的各方都深切感受到每个人只有合理地承认他人和自己的立场与观点无论怎么差异乃至对立，都具有源自于生命境遇中的合理性，但这种合理性在公共空间的呈现需要与对方沟通，这种深入的情感交流和无压力的沟通环境，让参与者都有意无意地把沟通和沟通的过程作为最直接的目标，而不是把论证、争辩、驳倒对方、要求对方有义务了解或接受自己的观点等作为目标，实际上对降低政治观点相左的人的敌意是很有成效的。^[19]

获得肯定和得到尊重是人性的需求。作为同胞，大陆民众应该充分肯定台湾同胞的成就，使其感受到荣辱悲欢可以在大陆得到共鸣的，其成就是能得到赏识与欣慕的。两岸同胞情谊的增进，其中包含着许多像温世仁先生、慈济等台湾人和台湾民间组织的无私奉献。其实，增进认同最好的方法就是荣辱与共，现今共辱是可遇不可求，而共荣却是我们可以做到的，随着大陆综合国力的增强，这样的机会会越来越多，不久之后的 2008 年奥运会不仅是两岸中国人共同的荣耀，也将成为两岸同胞共同参与的舞台。

四、结语

两岸命运共同体与两岸公共生活的建构和生发，是长期的事业。大陆必须更自信地看待未来自己的发展，也必须更自信地信任台湾同胞。

中国文化五千年的文明史，其深厚的积淀使得中华民族的命运共同体虽然在衰弱时或受外来冲击时往往陷入分裂的境地，却总能如春草般顽强地恢复生机，归于统一并强盛，所谓“撕裂有时，缝补有时”。两岸当前“合一分一合”的进程或许就是中国在冲破所谓近代以来的历史峡谷的一道关口。两岸在历史文化领域内的深厚基础，两岸经贸一体化所形成的两岸经济相互依赖和融合的态势，以及过去 20 多年两岸在其他领域内的往来所累积的资源，使得两岸民众之间就政治及其他领域内的沟通交流其实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而良好的沟通心态、沟通技巧及沟通环境的建构需要两岸的有志者在细节上、在日常的微观交流场域一点一滴建成。两岸的整合，应该是“正义与情谊”并胜的道路，而两岸在公共生活的沟通与交流中，少一些猜忌、提防、敌意、粗暴、骄矜、计较、对抗等负面情绪，多一些开放、信任、尊重、和谐、宽容、理解与同胞情谊，致力于创造两岸共享、共有的美好前景，共同培育两岸良性公共生活，假以时日，必定会使得两岸更多的民众具有参与的意愿，两岸命运共同体的凝聚力和亲和力更加深厚。

（本文为“国家统一创新团队”研究成果之一）

注释：

- [1] 国台办 2006 年 2 月 26 日针对陈水扁“废统论”的谈话，见 http://www.gwytb.gov.cn/gzyw/gzywl.asp?offset=100&gzyw_m_id=964
- [2] 命运共同体或生命共同体这些名词曾为李登辉和台湾泛绿政党操作和利用，他们以所谓“台湾共同体”的建构来切断台湾与祖国大陆的历史和现实联系的纽带，参见王茹《台湾的社区总体营造政策及评析》，《台湾研究集刊》，2003 年第 2 期。
- [3] 参见魏镛，《迈向民族内共同体：台海两岸互动模式之建构、发展与检验》，见（台）《中国大陆研究》第 45 卷第 5 期，2002 年 9—10 月，第 1—44 页，和《从中国历史分合看两岸整合前景——兼论民族内共同体的可行性》，见（台）《历史月刊》2002 年 9 月，第 91 页。
- [4] 张亚中，《两岸统合之理论与实践：欧盟经验的启示》，（台）《美欧季刊》第 14 卷第 1 期，第 35-81 页。
- [5] 江宜桦，《政治社群与生命共同体——亚力士多德城邦理论的若干启示》，见许纪霖主编《共和、社群与公民》，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 年 1 月版，第 128 页。
- [6] 参见哈贝马斯，《交往行动理论》，洪佩郁、蔺青译，重庆出版社，1994 年。
- [7]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2 月版，第 21 页。
- [8] 江宜桦，《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见其著《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社，2006 年 3 月版，第 311 页。
- [9] 江宜桦，《公共领域中理性沟通的可能性》，见其著《自由民主的理路》，新星出版社，2006 年 3 月版，第 317—319 页。
- [10] 汉娜·阿伦特，《人的条件》，竺乾威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2 月版，第 45 页。
- [11] 陈孔立先生虽然是提醒台湾研究学者须注意的四大原则，但实际上在两岸的交流中是完全适用的。见陈孔立，《台湾学导论》，（台）博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 年 12 月版，第 29—46 页。
- [12] 布鲁斯·拉塞特，《和平的结构：一种民主的、相互依赖的、制度化的秩序》，见《变动中的民主》，（日）猪口孝等编，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 年 12 月版，第 196—197 页。
- [13] 汪宏伦，《现代共同体当中的怨恨心态——一个对台湾经验的初步反省》，见《重建想像共同体——国家、族群、叙述》，廖炳惠、黄英哲等编，（台）“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2004 年 4 月出版，第 69 页、83、87 页。
- [14] 庄耀嘉，《族群与偏见在两岸关系中的角色：社会认同理论的检验》，见（台）《本土心理学研究》第 20 期《族群认同与群际关系》，杨国枢主编，台湾大学心理学系本土心理学研究室编辑出版，桂冠图书公司印制发行，2003 年 12 月版，第 73—104 页。
- [15] 汪宏伦，《现代共同体当中的怨恨心态——一个对台湾经验的初步反省》，见《重建想像共同体——国家、族群、叙述》，廖炳惠、黄英哲等编，（台）“行政院文化建设委员会”出版，2004 年 4 月出版，第 91—95 页。
- [16] 陈孔立，《台湾学导论》，（台）博杨文化事业有限公司，2004 年 12 月版，第 39 页。
- [17] 林劲，《浅析“文化台独”实质及影响》，见 <http://www.chinatxh.com/zt/2001-19/32739.html>。
- [18] 李丁讚，《公共领域中的亲密关系：对新港和大溪两个造街个案的探讨》，见李丁讚等编著《公共领域在台湾：困境与契机》，（台）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2004 年 9 月出版，第 393 页。
- [19] 王茹，《台湾民间社团的族群和解之尝试——以纪录片“面对族群与未来——来自民间的对话”为例》，见《台湾研究集刊》，2005 年第 3 期。

（英文摘要下转第 83 页）

- [14] 殷海光著、贺照田编《思想与方法：殷海光选集》，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版，第 56 页。
- [15] 《理想主义的实践之函义》，《牟宗三先生全集》卷 9，第 54 页。
- [16] 《理性的理想主义》，《牟宗三先生全集》卷 9，第 21-22 页。
- [17] 郑家栋著《本体与方法——从熊十力到牟宗三》，辽宁大学出版社，1993 年，第 252 页。
- [18] 《现象与物自身》，《牟宗三先生全集》卷 21，第 17 页。
- [19] [20] 同上书，第 16-17 页、第 127 页。
- [21] 王国维著、傅杰编校《王国维论学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7 年版，第 410 页。
- [22] 雷颐《中国现代思想史上科学思潮与人文思潮的冲突——“科玄论战”透视》
<http://www.1921.cn/new/zjsq/LY/view.asp?id=232>
- [23] 引自郭齐勇著《熊十力及其哲学》，中国展望出版社，1985 年，第 24 页。
- [24] 成中英《追述殷海光先生与评价殷海光思想》，贺照田选编《殷海光学记》，上海三联书店 2004 年，第 201 页。

The Difference of Mou Zhong-shan and Yin Hai-guang's Liberalistic Thought

JIANG Xiao-bo

Abstract: This paper enters into the liberalistic thinking of Yin Hai-guang and Mou Zhong-shan by analyzing their different academical background and their different idea of freedom. Yin Hai-guang accepted the philosophy of empiricism which originated from English culture. By the standpoint of logical empiricism, Yin took the freedom for a free space in which the individual could act freely. Mou Zhong-shan's Confucian liberalism combined Germanic spiritualism and Confucianism, thinking freedom about a moral perfection. This paper thinks that Mou and Yin's idea of freedom answered for the positive and negative freedom of Isaiah Berlin, and inherited the two different modern Chinese trend of thought—science and metaphysics.

Key words: Yin Hai-guang, Mou Zhong-shan, logical empiricism, Germanic spiritualism, neo-Confucianism.

(上接第 7 页)

The fate community of cross-strait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ublic life of cross-strait ——On the focus of the people's communication across the strait

WANG Ru

Abstract: There are differences, divergences and detachments in many fields of two sides of cross-strait because of historical and current reasons, especial in public opinions. The re-emergency, keeping and growing of the fate community of cross-strait need more effective connec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of people of two sides. Now by connections and communications of people of two sides in these years, there are many successful works in the common market of cross-strait, and there are great improvements in other fields. On these bases we endeavor to construct the public life of people of cross-strait for more earnest communications and sharing the meaning of the life, which is supportive to building the understanding way of people of two sides, reaching more consents by people of cross-strait, and developing the affinity and the close feeling of the fate community of cross-strait.

Key words: The fate community of cross-strait, The public life, The public sphere, Communication